

侗寨占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与启示

杨军昌

【提要】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对侗寨占里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进行了总结,探析了该地实行计划生育、保持人口恒定的社会机制和具体方法。认为占里侗族的人均意识、生育文化及其实践经验,对搞好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 杨军昌 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副教授。

占里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的一个侗族自然村寨,座落于都柳江沿岸四寨河口北上的山谷间,海拔380米,距从江县城20公里,土地面积为15.97平方公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创造了两项为世人所叹的记录,一是人口增长率近乎为零,二是刑事案件发生率为零。加上远古相沿而来的奇特民俗和文化,这里被人们喻为当代“世外桃源”。

一、占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绩效

占里侗族自古就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习俗。据考究和《从江县志》记载,占里村先民曾居住于广西苍梧郡,后因战乱与饥荒,被迫溯都柳江而上,几经波折辗转来到占里定居,距今约有千余年之久。从占里传唱的古歌中得知,最初到达这里的仅吴姓兄弟5户。随着岁月的流逝,5户演变为5个房族。清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多,寨中人地矛盾、社会治安问题不断突出,一位叫吴公力的“寨老”从鸟雀与生态环境和人与船的关系启发下,根据本村的人口发展速度和田地面积、森林状况,定下寨规,确定占里人口不能超过160户700人,为达此目标,具体规定一对夫妇有50担稻田的可以养育两个孩子,有30担者只能养育一个孩子。之后,随着人均占有田地的相对平衡,在“寨老”(其名不详)的主持下,讨论、改定寨规为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并在款约中强调,如有违反寨规,就将之逐出寨门,或由其亲属处以重罚。这一寨规于是得到了占里一代又一代的极力呵护和遵从,并形成了占里人独特的生育习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实效。

占里侗寨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自1988年起就有相关报道。笔者于2000年暑期到该地进行了长达十余天的专题调查,在从江县计生局、高增乡计生站有关领导、专职干部的帮助下,通过入户采访、问卷调查、档案查阅、资料反馈等工作,确定了占里的人口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甚至不少年份的人口处于负增长。从有人口文献记载的1952年开始,到2000年的48年间人口近乎为零增长。基本上实现了人口控制目标。

从表中可以看出,占里人口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人口增长长期保持恒定数,不少年度处于低增长和负增长,平均自然增长率接近零。从现有资料看,占里一直将户数控制在160户之内,绝大部分年度人口未超过700人,人口变化不大。由于占里社区的通婚都在所属的5个房族内进行,迁入迁出极为罕见,固其人口增长率可视为其人口自然增长率。1952~2000年,平均年自然增长率低于2.3‰,其中1952~1965年为负增长。1956年

人口为 675 人,到 1988 年仍为 675 人,32 年间人口增长为零。又如,1982~1988 年 6 年间,人口也呈零增长态势。在人口突破 700 人的 1991~2000 年,人口净增 25 人,年均人口增长率为 3.5‰,远远低于同期贵州省和黔东南州的平均水平。在家庭规模上,占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户均人数最高年份是 1983 年,为 5.4 人;最低是 1956 年,为 4.4 人;平均户均人数为 4.8 人。也就是说,这里的户均人数除一对夫妻外,仅有两个孩子和 0.8 个老人,即夫妻与其所生子女恰好对等。家庭养老具有良好的基础。

第二,家庭拥有子女数及代际、年龄结构。2000 年,占里共有已婚育龄妇女户数为 132 户。其中,1 子 1 女户占 57.6%,2 子户占 4.5%,1 子户占 10.6%,1 女户占 21.2%,无子女户占 4.5%,1 子 2 女户占 0.8%,1 女 2 子户占 0.8%。90%以上的家庭只有 1 或 2 个孩子。据调查,三孩户的出现,均为节育手术失败所致。家庭户中以三代户、两代户居多,分别占 43.5%、39.2%。五代户仅有 1 户,即吴老家五世同堂 8 口人。根据对该村 400 人的问卷调查资料计算得出,占里成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老龄化程度较高。0~14 岁人口所占比例为 18.34%,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 7.2%,年龄中位数为 29.6 岁。老龄型人口特征比较明显。

第三,身体素质。占里女子平均身高在 1.50 米以上,男子在 1.58 米以上。由于衣食丰足和禁止近亲结婚,村民体魄健壮,智商较高,全村没有先天性的残疾人和痴呆儿,没有出现一例癌症患者。1999 年,全村有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 47 人。该年占里去世的 5 个老人中,65 岁 1 人,74 岁 2 人,80 岁以上 2 人。平均寿命为 70 岁以上。

第四,人口与环境、经济的关系。占里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达 75%,8 平方公里的原生林区葱绿滴翠,生态平衡。这里人均耕地资源相对富足。1999 年全村有耕地 1 030 亩,人均 1.42 亩,高出从江县人均耕地(0.7 亩)1.03 倍。该年人均粮食 760 公斤,人均纯收入 1 510 元,分别高出全县 1.19 倍和 0.23 倍(黔东南州史志办,2000)。虽然占里的人口节育惯制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对接中经历了一个磨合短暂过程并于 1990 年突破了 700 人的控制目标,但仍是保持恒定的低增长态势,实现了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的良好结合。

二、占里实行人口控制的观念与社会机制

占里这一地方长期以来能坚持不懈地实行人口控制并取得突出绩效,究其原因,一是缘于该地深入人心的朴素的人均观念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二是他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与之相融合的社会机制。

据占里古歌记载,占里建寨之初,为防备子女间对土地、财产的纷争之患,吴氏兄弟父母生前就对兄弟 5 人拥有的财产、耕地、山林等做了平均分配。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口的增多,兄弟 5 家演变成了 5 个互相通婚的集团,侗语称之为“兜”。5 个“兜”都有 1 个“蒙高”,即头人。“兜”之下是“基”,其由“兜”分出按血缘的亲疏远近结合而成。“基”与“基”之间是兄弟姐妹关系,即“同兜各基”。

表 侗寨占里人口变化状况

年份	户数	人口总数	年份	户数	人口总数
1952	156	729	1985	125	665
1956	153	675	1986	125	673
1957	—	625	1987	133	671
1965	131	490	1988	133	675
1970	142	563	1989	133	680
1972	141	607	1990	133	695
1974	—	623	1991	136	714
1975	—	623	1992	142	712
1976	—	641	1993	146	713
1978	—	648	1994	146	720
1979	—	653	1995	148	721
1980	125	654	1996	149	725
1981	125	661	1997	149	727
1982	126	673	1998	151	730
1983	126	682	1999	152	734
1984	126	672	2000	154	739

资料来源:(1)占里户口资料;(2)从江县档案馆藏第 105 全宗;(3)高增乡计划生育服务站人口资料。

“基”之下是“公”。家庭是占里社区中最小的单位,侗语称之为“然”。在财产关系上,5个“兜”各自的财产均层层分配至最小的单位“然”。“然”多则地少,“然”少则地多。而表现在一个具体的家庭中,子女的多少决定着财产分割的份额,多生则田土少,少生则田土多。因此,占里自清代中期起就在其“款约”、“古歌”中规定和传播着“七百占里是只船,多添人丁必打翻”,“家养崽多家贫困,树结果多树翻根”,“一株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崽多无用,女多无益;崽多要分田,女多要嫁妆;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等朴素的人均思想和适度人口观念。正是这些思想观念的代代相传和深入人心,占里侗族人民节制生育行为得以代代坚持。

与朴素的人口思想相伴随,侗寨有着一整套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机制:

(一) 社会组织相对集中,便于组织和开展有关社区的社会经济活动

前已有述,占里的社会组织有如一个金字塔型。其底部是“然”;其上为“公”;再上为“基”,“基”上为“兜”,“兜”上是寨。全寨有“寨老”1人,“蒙高”5人,“基长”若干人。这些社会组织层层相依,最后归于“寨老”,既有利于决策的民主,更有利于款约、寨令的制定和贯彻执行。

(二) 有自己的习惯法,在寨务管理和寨事处理上“有法可依”

习惯法,是一个民族、一个社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习惯。它与权力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社区的运行和整合。占里的习惯法有30余条,内容涉及耕地、山林、习俗、婚姻、人口、财产、治安等方面。其中涉及到人口的条款有“占里是一条船,人多了就要翻船,人口要有节制”,“人口可有增加,土地可有限定。多生一男,没有田产,讨不到媳妇;多育一女,没有嫁妆,找不到丈夫”;“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谁家多生孩子,就拉他家的猪、牛来杀吃,同时全村对其进行羞辱。还要多生多养的,就逐出寨门”。占里对习惯法的执行非常严肃,而且要由亲属执行,因而威慑力较强。又如在婚姻上,款约规定,结婚后,夫妻双方不准离异,尤其是育有孩子的夫妇,如有违反,除禁止离婚外,要罚其300斤稻谷、50斤酒、100斤肉充公。这些规定,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和人口的控制。

(三) 有较完善的财产继承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占里侗族在财产继承上,实行的是直系继承制和横向继承制两种。在前者,男女都有继承权,但继承的财产种类和数量不一样。按规矩,男子继承稻田、旱地、山林、宅基地、房屋、禾仓、家畜家禽、家具和农具;女儿继承“姑娘田”(陪嫁品)、棉花地、首饰、布匹和一半菜园。凡是祖先遗留给父亲的财产,女儿没有继承权;若是父母购置的财产,父母也可以划出一部分归女儿继承。这种继承制下,男儿则负责父母的养老及后事,女儿则负责父母的衣服。横向继承制则是针对有子无女或有女无子而言。若有女无子,女儿可以全部继承父母购置的产业,但祖上遗留下来的财产则交由叔伯兄弟平均分配,而其父母的晚年赡养、丧事及费用相应由他们负责、承担。若有子无女,属于女儿继承的部分,由男孩暂时代管使用,到下一代有女儿时再交给她们。若家中有两女而无子,属于女儿继承的财产由两人平均分配,属男孩继承的部分则由叔伯兄弟中过继一人继承,并承担相关义务。不管是直系继承或是横向继承制,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子女的多少决定着财产继承的多少。换句话说,则为“人多则财产少”,“人少则财产多”。虽然这种财产继承制度带有明显的封建文化色彩和一定的重男轻女成分,但相对而言,这样的财产继承风俗和养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为了生男孩而不断生育的结果。

(四) 有“亲从嗣名”的命名制度

这种命名制不同于父子联名制。父子联名制必须是有父有子,若有父无子,联名制就无法延续下去。这种命名制是促使人们生育男孩的动因之一。而亲从嗣名制则恰好相反,它是一种以新生的第一个孩子(不论男女)的名字为准,从而使父辈、祖辈的名字也相应发生变化的一种制度。占里的这种命名制没有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之意,所生子女的性别无关宏旨,有利于人口控制制度的执行。

（五）实行“寨内兜外”的婚姻制度

由于占里的相对富裕而带来的自我封闭和男女性别比例的协调,占里男不娶外村女,女不嫁外寨郎,婚姻关系囿于寨内族间。从保证人口的素质计,婚姻只能在不同的“兜”内进行,同“兜”之间一般不得通婚,即使通婚,至少须在三代以上,绝对禁止姨表婚、姑表婚。在婚龄上,占里人提倡晚婚晚育。谁当“罗汉”(侗语,未婚青年)时间越长,就是大多数青年羡慕的对象。反之,谁结婚早,就意味着他早当老,就会先进入坟墓。该村的习惯结婚年龄在18岁以上,30岁左右生育子女在全村绝非个别。

三、占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方法

侗寨占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理念源于他们祖先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得益于他们对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了使人口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之内,不致人多“船”翻,除了上述社会机制的作用外,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

（一）加强对人口控制的宣传教育,严格执行习惯法中的有关条款

占里的年节有春节、燕子节、吃黄米饭、撒秧种、吃糍粑、开秧门、破鸭头、六月六、香婆节、八月初一、吃新节、压禾仓等。其中农历二月初一的燕子节和八月初一节主要就是用来宣传为什么要保持人口恒定数,节制人口增长的。因为这里认为,二月初一是燕子飞回来的时日,是春天的开始,人们从此规划一年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要规划人口生产,这实际上是当地一年中两个生产的布置会、动员会和宣传会。八月初一是一年中收获季节的开始,如何安排好收获物,使“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协调发展,则要在这天举行活动进行动员和宣讲。两个节日均由寨老主持,全寨男女老幼聚集于鼓楼坪,杀猪、祭祀、聚餐、吹芦笙后由寨老宣讲寨规款约,安排生产。其中每次必首先叙述祖先们建寨的经过及其筚路蓝缕之功,叙述为何立下每家只生两个孩子的规矩。这种宣传教育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以至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

在占里的传统社会中,既有家族社会组织“兜”“基”“公”,又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组织“宁劳”,还有男性青年组织“纳罕”和未出嫁或出嫁后未生育孩子的女性组织“告班”。这些组织各自有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如“宁劳”老人一般在寨子中有威信,他们均参与村寨事务的讨论与决策,是“寨老”的参谋和顾问(当地政府基层政权的村委会主任、支书等,一般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且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他们主要传达执行上级政府组织的指示精神,具体到本地事务的处理和决定,仍受约于“寨老”等,故一般在占里要实施重大决策,必须依靠当地的“寨老”和其他组织,否则就难于获得成功或圆满成功。事实上,政府基层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又是这里社会组织的成员,因此,这里既能按自己的传统社会机制运行,又能较好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纳罕”是占里侗族社会的生力军,除生产劳动外,修桥补路、扫寨、公益重活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告班”的义务是代表村寨与外寨来做客的人娱乐对歌,迎宾送礼等。这些组织既形成了这里的一个社会控制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宣传网络,他们都在婚姻、生育和人口控制上行使自己的宣传职责。

除社会组织外,占里社区的精神领导尚有“歌师”和“鬼师”,其中“歌师”有男女数名,“鬼师”一名,两者职责不同,但都是社区文化的传播者和精神领袖,他们用歌词、款词、祭祀等宣传着人口与耕地、人口与财产、人口与发展的朴素人均思想和节制人口增长的寨规、款约,使这里的人口文化代代相传。

（二）实行土法节育措施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占里先辈经过不断探索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节制生育的方法。即靠民间中草药秘方进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这些办法由寨中的中老年妇女掌握,一般1兜1个,传女不穿男。当地称“药师”,他们的职责是:(1)给即将结婚的青年男女讲授生

理、生育、节育知识；(2) 给怀孕的妇女定期检查并接生；(3) 给避孕失败的妇女做人工流产、引产；给需要避孕绝育的妇女、男子发放中草药等。妇女怀孕期间，药师采配中草药帮助健体安胎，妇女生育后，则服用一种叫“血美”的草药汤，这种药剂能使产妇口味好，恢复快，后遗症少。如要避孕或绝育，药师均施以不同的药方，服后便可达到避孕和终身不育的效果，且对身体无任何副作用。自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实施后，占里村民们感到本村的传统生育制度完全符合国家对计划生育的要求而十分拥护，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更高，而土法节育也逐渐被现代科学方法与药具所取代，以至占里今日“药师”后继乏人。

(三) 发挥婚姻机制的作用

一是奉行“不落夫家”的习俗和提倡晚育。由于有对歌、跳芦笙和“行歌坐月”等活动，占里自青年男女交往自由平等，结婚年龄在民族地区相对较晚。1987年，全村8对青年男女结婚，女子平均年龄21.25岁，最大的27岁，最小的19岁；男子平均年龄23.13岁，最大的26岁，最小的20岁。男女结婚后，女方不马上“落居夫家”，只是在农忙季节或夫家有大事需要媳妇帮助张罗时，女方才落住夫家。直到身怀有孕或年岁已大，才定居夫家。这种习俗，使早婚不致早育，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3岁以上。二是结婚时间全寨统一。占里侗族在一年中只有农历2月16日和12月26日为结婚时间，其余时间不准结婚，这里的人们认为，结婚与生育是因果关系，只有统一了结婚时间，也就大致可以规划和控制人口的出生时间和数量。

(四) 节育习惯已经形成

占里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已形成节育惯制。为了控制人口，过去存在着溺婴现象。但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和科学节育方法的普遍接受，溺婴现象在占里已不复存在。

四、占里长期实行人口控制的启示

(一) 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各民族群众长期的艰苦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文化素质较低，生存环境退化已经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薄弱，一部分群众甚至仍处于贫困之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恶性循环。原来山青水秀的地方不少因人口超载而逐渐沙化、石漠化，生存环境压力日益摆在了当地民众面前，这些皆与占里侗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新的世纪中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和繁荣富强，必须在少数民族地方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二) 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能够搞好计划生育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的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党和国家从维护稳定大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出发对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倾斜照顾政策，其中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有适当的放宽，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举措。但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和计划生育干部中长期存在着一个观念误区，认为“放宽”就是在少数民族区域不搞计划生育，或者说在少数民族地方难以搞好计划生育，因而不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计生工作，不去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地区计生工作的不同情况、问题特点和方法，看不到少数民族地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紧迫性，主观判定少数民族地方没有计划生育的意识，没有搞好计划生育的条件。占里侗族自古就实行计划生育并拥护、支持党的政策，取得了令人叹为奇迹的事实，足以说明少数

民族地区也能够搞好计划生育,做好人口控制工作。占里的经验,值得人们重视和总结。

(三) 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人口问题“两手抓”,即一手抓数量控制,一手抓素质提高

占里侗族在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上可谓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人口素质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上也达到了世人认可的高度,但在其中的科学文化素质上却不那么乐观。据调查,占里现有公办小学一所,1999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2%,巩固率为80%,但在1995年之前仅分别为80%和60%。其中辍学率高达40%以上,毕业率不到60%,1999年中学就学人数不到10人。全村的文盲率高达70%。这一方面有政府工作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当地侗族同胞的观念意识问题,而这种观念意识又主要缘于与周边村寨在生产资料、生活水平相比较产生的优越感、满足感,缘于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封闭与半封闭意识。其结果直接造成了占里侗族人民在文化素质上的落后,这是应该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尺度,一个民族地方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住了,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人口的质量没上去,民族教育的发展落后于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会严重地阻碍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因此,在民族地区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同时,政府既要在发展民族经济、加大民族教育上下重力,又要在促进民族人口思想的转变、观念的更新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提高民族人口素质。

(四) 要致力发展民族经济,搞好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工作

现阶段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民族地区尽早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才能为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占里侗寨的相对富裕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区特色的保障制度用事实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效地避免“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民众树立新型的生育观念,消除“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思想。不少贫困、欠发达地区的人口问题日益突出、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上述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致。诚然,占里的社会保障也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或者说其仅仅是占里侗族民众历史的创造,是自然而又朴实的,但其在占里本土节制人口增长上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应低估的。

(五) 在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可因时因地调整民族地区的人口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一个鼓励生育、70年代有利于生育、提倡计划生育、实行计划生育但比汉族“适当放宽”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与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及其相伴而生的人口问题紧密相连的。现在的事实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很不平衡,而产生不平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问题。因此,在坚持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现行政策不变的原则下,可根据不同地区的状况作适当调整,据时据情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实行同汉族地区一样的人口政策,以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 黔东南州史志办:《黔东南年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从江县志编委会:《从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